

世界比较诗学史的话语建构

——兼及对《世界比较诗学史》的评论

方汉文

《世界比较诗学史》是以世界四大诗学体系(中国、印度、西方与波斯—阿拉伯)为纲目的诗学史,旨在建立比较诗学的中国理论模式与话语,这是一部以理论观念创新为目标的论著,涉及诗学史与诗学理论的广阔维度,征引了较为丰富的材料。目前欧美学者尚未见有类似论著,甚至亦未闻其有过此类计划。中国学者目前所进行的工作与西方学者斯皮瓦克等人提出的全球化时代“学科死亡”之类的说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经学术界多位专家论证后,笔者受命组织课题研究,该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与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课题成果之一,学术界早有评定,国内外学者或伸纸以援,或耳提面命,皆有利于该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近期我们也看到了周荣胜《到了书写比较诗学史的时候吗?——评方汉文主编的〈世界比较诗学史〉》(以下简称《到》文)一文的相关评论,以“借助国际性的大组织也没能写出一部世界性的诗学史来”为由,认为“现在还不到写作世界性的诗学史的时候,韦勒克再生或许也写不出来……”因对其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未敢遽然认同,下文仅就评论中所提出的疑问进行简略分析。非是君子好辩,实不得已也。

一、关于“比较诗学”的“理念”

我们首先讨论的是:什么是比较诗学?

因为《到》文批评《世界比较诗学》时指出其“缺乏一个明晰的比较诗学和世界诗学的理念”,然后提出了自己的比较诗学定义^②。笔者以为这种“理念”与目前学术界所通用的范畴相距甚远,而且有互相抵牾之处。

什么是所谓“综合的、理论的层面”?要“综合”什么?既然比较诗学的对象“限定”在“诗学即文学的理论层面”,那么这个“诗学”岂非与前一个“综合的”诗学相矛盾?而且,比较文学的“所有原则”可以直接运用到比较诗学中,那么,比较文学中最基本的原则,如历史影响比较与逻辑美学比较当然可以运用到比较诗学中,然而为什么比较诗学又不是“诗学的比较”,而是变成了“理论问题的汇通研究”?所谓“汇通研究”,顾名思义当然只是不同诗学对于同一问题的

汇通讨论,那只是比较诗学的研究实践,而不可能成为比较诗学,更不可能取代比较诗学史。

其实作者在这样一篇书评中再次进行比较诗学的定义的“创新”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比较诗学的定义(包括所谓“理念”)在比较文学中是基本的分支学科范畴,中外学者关于比较诗学已经有过大量的研究,它的定义是经过反复论证而且已经约定俗成的,不必进入这个学科的每位研究者都要提出一个自己的定义或理论,否则只能引起概念的混乱与争议。

诗学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学理论,直接来源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书名。美国学者厄尔·迈纳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使我们能够把这个词定义为对被看作自律主体的文学(他指的是戏剧)的性质和实践所作的描述。”^③西方的“诗学”概念以后就是所谓的“文学理论”也包括文学批评,这在世界学术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如黄宝生先生所说:“在世界范围内,诗学(Poetics)这一名称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后来成了欧洲学术史上文学理论的通称。而在现代,诗学一般已改称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或文学批评(criticism)。”^④学习外语(比如法语)的学者更应当知道,那种普及性质的法国大学128丛书中,法国学者达维德·方丹的《诗学——文学形式通论》一书中说:“这样就对诗学的概念做了重要而明确的界定——这个概念便是本书所要研究的,即诗学指文学的整个内部原理(toute théorie interne de la littérature)。”^⑤这种在各国大学里已经成为基本常识的概念(由于这本书的内容较浅显,我们历来只推荐作为硕士生的参考书,博士生参考书是不列入的),作者竟然完全不知,却要来批评诗学论著,真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关于“比较诗学”,《到》文作者的看法就更与学术界通用的概念格格不入了,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定义就是,比较诗学是不同民族与国家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比较研究。这与诗学的概念是一脉相承的,与《到》文所说的“理论问题的汇通和研究”或是“跨学科的研究”之类说法风马牛不相及矣。

中国近年来比较诗学的著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对于这个概念有明确定义,我们仅选取其中几例:

钱钟书先生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⑥

此处明确指出比较诗学就是文艺理论的比较,这类定义比比皆是:

中西文艺学(诗学)的比较,是根植于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比较,确实难度很大。进行这种比较,必须对中西文论都有相当的了解。^⑦

此外还有更为简明的一些说法:

我们可以将比较诗学粗略地界定为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理论进行的比较研究,“跨文化”是比较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研究首要的学科特征,“跨文化”也是比较诗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理论研究的首要特征。^⑧

为了避免重复,我们不再征引,以上所引虽然论述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基本观念是完全一致

的,即比较诗学是不同文化中的文学理论或批评的比较。“我们认为,比较文论学无疑应当研究不同文化的文学理论或诗学的历史形态,这是比较诗学建立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它区别于通常的文学理论或诗学理论”^⑨。可以看出,无论是学术界通用的范畴还是笔者一贯坚持的比较诗学观念,都与《到》文中的概念不同,我们无论是在以前的论著中或是《世界比较诗学史》中,都是以这种观念为指导的,并且以此为依据对不同的诗学体系进行研究,不知为什么突然变得“不清晰”起来?依笔者之见,“不清晰”的可能正是《到》文中的“比较诗学”,说它不清晰,是因为与国内外学者所通用的概念相距甚远,属于作者杜撰的概念。如果有作者所说的那种“跨三个领域”的比较诗学,就不需要比较文学或是任何一种文化研究了,因为所有的研究归根结底都有“理论层面”,这样的“比较诗学”不仅包罗万象,而且缺少一种学科的基本界限。没有学科特有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就是这种定义的根本缺陷。

我们并不否定作者有追求创新的意思,但是任何创新必须是在公共学术话语的基础上,而不是使用一种悖于学术基本范畴的话语。作者一再强调的“外语水平”或是“材料功夫”等方面,我们都是十分赞同的,当前学术界确实存在不能认真校对就引用外文资料、不梳理资料等弊端,但是也要注意,基本的理论话语仍然是对话的前提,而且这些范畴也与外语水平等方面直接相关,如果作者能先对“比较诗学”一词的英、法原文所指进行梳理,可能对讨论更为有利。

二、“比较诗学史”的“历史”

《世界比较诗学史》的撰写有其语境,近年来,西方学者推出了一些诗学史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法国让·贝西埃等主编的《诗学史》。编者在“导言”中说明该书的写作得到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支持,这对于世界诗学研究当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编者也明确指出:

拙著带有明显的比较色彩,但是却不想勾勒导致此种诗学建立的民族间的影响史和关系史。它谨介绍民族间背景和语言间背景基础上的西方主要诗学概况,并注意把拟定普遍性问题的愿望与对答案的相对性的清醒意识结合起来。^⑩

很清楚,这种诗学史是以“西方主要诗学”为视域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撰写中国包括东方其他民族与西方诗学共同的比较诗学史呢?考虑到当代国内外比较诗学研究的经验,我国学者已经出版了《中外比较文论史》等著作,撰写世界比较诗学史是必要的,无论是对于西方还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

《到》文主要是在这一方面与我们存在分歧,其观点如下:

第一,关于“书写”世界比较诗学史的时间,认为现在没有人能够写出世界比较诗学史,原因是“还不到时候”。文中说:“换个角度看,现在还不到写作世界性的诗学史的时候,韦勒克再生或许也写不出来,一个学者甚至一个团队的外语水平、材料功夫,以及比较诗学、世界诗学的观念都尚未成熟,很难去贸然尝试大而全的诗学史。”

第二,关于写作主体,“国际组织”(此处不清楚具体哪个组织)没有写出“诗学史”,因为诗学史需要更多的“文化积累”,所以中国人更不可能有此话语权。文中一方面认为“其实,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也曾尝试过诗学史的写作。上个世纪末,让·贝西埃等人在学会的组织下主编了一部大部头的《诗学史》……”(我们从该书的导言中看到,编者只是提到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

的“荫护”并且声明文责自负),另一方面则反对中国人写比较诗学史。

第三,指责拙编《世界比较诗学史》存在“外语水平”等方面的缺陷,举例是引用了某一种译本,而没有引用他所心仪的译本,或是译文与他的理解不同等等。

第四,批评《世界比较诗学史》这部以世界四大体系为纲目的诗学史是“自我中心”,而只写了西方诗学(其实只是欧洲几个国家)的法国学者主编的《诗学史》并不被认为是自我中心,而是实事求是^⑩。

首先,无论是世界比较诗学史,还是世界诗学史或诗学史,只要有东西方不同诗学体系的存在与联系,任何时间都可以书写。正如比较文学史、比较宗教史、比较教育史等其他著作一样,法国学者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早就由傅东华先生翻译于1930年,在上海书店发行了,在全球化的今天当然可以书写比较诗学史。关于世界比较诗学与中国比较诗学史(包括中西比较诗学史、中印比较诗学史、中外比较诗学史等不同类型)的起源与主要发展阶段我们已经在多部论著中指出,不一一罗列了^⑪。

我们仅列举几部常见著作中对比较诗学史的论述,就可以证明,不仅诗学史,就是中外诗学史等多种诗学史也早已出现。

严格意义上的比较诗学研究则是由王国维开其端绪……王国维之后至1949年,诗学比较研究的成果不是特别丰硕,其中颇值一提的只有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8)、朱光潜的《诗论》(1943)、陈铨的《文学批评的历史动向》(1943)、钱钟书的《谈艺录》(1948)等少数几种著述……近年来,比较诗学的研究又出现了较大的突破。一是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如曹顺庆的《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1998)不惟探讨了比较诗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而且还突破了一般诗学比较研究仅限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做法,把印度、日本、朝鲜、越南、阿拉伯等民族文论也纳入了研究的范围。^⑫

笔者特别要指出,这里其实只是部分论著,大量比较诗学的论著由于篇幅限制,是无法一一列出的。例如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1988)、黄药眠、童庆炳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1991)、狄兆俊的《中英比较诗学》(1992)、乐黛云等主编的《世界比较诗学大辞典》(1993)、朱徽编著《中英比较诗艺》(1996)、饶芃子等主编的《中西比较文艺学》(1999)、《比较文艺学论集》(2003)、陈跃红的《比较诗学导论》(2005)和李夫生的《中西文论比较与批评》(2005)等。尚不包括可以划入比较诗学范围的一些专著如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1992,中文版由冯川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及近年来出版的杨乃乔的《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2006)、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1999)等。此外还有港台学者与海外华裔学者的比较诗学论著,包括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1975)、叶维廉的《比较诗学》(1983)、奚密的《隐喻与转喻:中西诗学比较》(1982)等,不一而足。

为什么《到》文会对如此波澜壮阔的比较诗学研究运动视而不见呢?

所以我们建议作者不要轻视中国人所写的(包括港台与海外学者)的比较诗学论著,其中相当大的成分其实就是比较诗学史,只不过没有使用“诗学史”的名目而已。同时一些流传较广的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学理论选读》(*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等外文论著,读原著与译本均可。

由于西方理论的退潮,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家相继离世,花拳绣腿的“法国式理论”在欧美的市场也极度萎缩,只有詹姆逊、伊格尔顿与斯皮瓦克等人仍

然苦苦支撑,没有什么重要理论观念与论著行世,几乎引不起中国大的反响。所以像《到》文所提到的卡勒的《文学理论简介》(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之类的小册子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已经不过是文学理论的普及读物了,最好还是多研究一下国际、国内比较诗学的基本资料,特别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这是中国人研究比较诗学的基本功。

三、中国学者的创造:汉化的比较诗学模式

中国人能否撰写并且写出世界比较诗学史是问题的核心。

首先提出世界比较诗学这一目标的并不是我们,我们只是中国比较诗学模式的最早实践者之一,这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为什么能通过全国广大专家论证,批准立项的原因。《世界比较诗学史》是首部以世界四大诗学体系为划分来研究世界诗学史的论著,这种划分、历史分期与模式是中国学者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能理解课题与成果的贡献。

最先提出这一模式的是季羡林先生:

我认为,世界上有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罗马文化体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四种文化系统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同时,我也考虑是否可以简化一点,就分作东西两大体系,西,即希腊—罗马文化;东,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闪族—伊斯兰文化。^⑭

这种世界文化体系划分观念产生广泛的影响,特别表现于世界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学甚至国别文学诗学的研究之中。季羡林先生的学生,著名印度诗学与东方文学专家黄宝生的《印度诗学》序言,再次强调了这一观念:

在古代文明世界,中国、印度和希腊各自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文艺理论,成为东西方文艺理论的三大源头……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颇得汉唐气魂,充满求知欲和好奇心,研究的触角伸向古今中外一切领域。在文学理论界,出现了比较文学复兴运动。它的领袖们倡导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强调打破欧洲文化中心论,将广大的东方纳入比较文学视野,努力开展东西方文学比较和诗学比较。这一宗旨也得到西方比较文学界有识之士的赞赏。^⑮

黄宝生的划分虽然与季先生和笔者的稍有差异,但基本模式完全一致,只是从古代文明世界角度,没有将波斯—阿拉伯诗学划入,这是完全正常的,因为阿拉伯诗学是在公元7世纪之后才兴起的,特别是它经过百年翻译运动之后才形成的体系,不属于古代文明世界。

《世界比较诗学史》就是在这种语境中产生的,它是一种由几代中国学者共同的观念指导下的创新,首次将世界诗学的历史由四个诗学体系的总体结构来论述,划分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比较观念与方法对世界诗学的历史与发展规律进行总结。正因为这种观念、模式和话语都是由中国学者所提出的,所以它是汉语书写的,具有与西方、与世界对话的重大意义。

从四大诗学体系研究世界诗学史的创新价值,首先在于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传统的欧洲

诗学史甚至中外比较文学史都不具有这种世界性的总体观念,这种观念是将世界诗学的发展看成一个总体结构,看成是一个彼此关联的系统来研究的。如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诗学的交汇融通;自汉魏之后到唐代,印度佛经诗学与中国诗学的交流;近代世界大航海之后,中国与西方、印度与西方、日本与西方的诗学融合等。这些世界性的大交往是世界性体系之间的交流,如果仅从单独的国家之间的交往来考察是无法看到全貌的。

比较方法包括逻辑与美学的比较以及历史的联系,由于世界诗学体系是独立起源的,并不是某一种诗学的传播,所以逻辑与美学的比较是植根于不同民族文明关系基础上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把握。同时,重大的历史交流则从诗学的接受与辩证发展角度考察其流变。这样,《到》文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文中提问“书中看不到比较的痕迹”等,其实,比较诗学的基本方法分为逻辑美学与历史联系两种,作者的批评文章中也不乏提到“对理论的跨文化的平行研究”“难道只许自己“平行研究”,就不许别人平行研究”?世界诗学史研究中,选择有重要历史交流的时期,如汉唐以来中国与印度佛经诗学、古代近代中国与日本、俄罗斯诗学的交流等等,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对各主要诗学体系进行逻辑与美学的(即所谓“平行”)的研究,这是完全正常的,也是最基本的研究方式,无须再进行解释了。

《到》文中的疑问我们只择其要点进行简单答复。

为什么在四大板块之中专论了“日本”和“俄苏”等国家的诗学?这样的问题提法也是不对的,表明提问者根本不懂“文明体系”的含义。一种文明体系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文明形态,正如西方文明不是希腊一个国家一样,它包括欧美主要国家,同样,波斯—阿拉伯、中国与印度体系都包括多个民族,如波斯—阿拉伯诗学体系包括了古代波斯(伊朗)与阿拉伯大帝国的诗学,中国诗学体系则部分包括了古代中国、日本、越南和朝鲜等国的诗学,印度诗学体系包括了印度与巴基斯坦、东南亚一些受到印度文明影响的民族等,这都是基本的比较诗学原理。俄苏诗学是西方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作为西方诗学体系的构成还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与中国的历史关联,我们都要进行重点研究。

其他问题如“能忽略古希伯来、非洲大陆吗?”

我倒要反问一下,请您告诉我古希伯来(莱)与非洲大陆有什么诗学体系?

我劝作者先要看一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对于世界文明的划分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再来讨论比较诗学,并非所有的世界古代民族都能称为“世界诗学体系”,古代希伯来文明经历了三次世界性的大离散,希腊化之后,融入西方,直到现代才有以色列建国,何来诗学体系?非洲文明的代表古代埃及文明在公元前被罗马所灭亡,以后又经历了阿拉伯化,直到今日仍然是阿拉伯世界的一员,其诗学当然是波—阿诗学的一个部分。提问者可能对世界文明的历史背景不太清楚,有必要先进行研究,然后再讨论世界比较诗学就会顺利一些。

最后,由于《到》文中反复提到笔者主持的课题,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世界诗学史》与课题的关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与教育部重大课题主要有以下创新:

1. 中国式的比较文学原理体系建构,代表作为专著《比较文学高等原理》(2002),教材《比较文学基本原理》(2002)等,此外在国家权威与核心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2. 东西方文学史的比较与交流研究,代表作是《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上下册(2005),约150万字,此外在学术刊物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

3. 世界比较诗学史研究,代表作为主编《世界比较诗学史》(2007),以及论文多篇。

4. 比较文化与比较文明研究,代表作有专著《比较文化学》(2003)等,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以上成果全都标明是课题成果,共计专论著5部6本,论文40多篇,获得了省级以上奖励多

项,各类书评、转载与简介20多项,受到学术界与专家的肯定。《世界比较诗学史》只是课题的成果之一。对于课题的评价,全国专家与广大读者有大量论著予以肯定,但是也要看到,由于课题的总目标是创立中国式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新体系,实现历史所赋予中国学者的义务,各式各样的问题都会产生,这并不奇怪。以上所有成果,我们都欢迎批评,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对于批评中的不实之词,我们则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予以澄清。

四、关于注释与引文

《到》文花了极大的篇幅,反复对注释引文的“指正”,其实只是对《世界比较诗学史》中大量文献资料中的部分译文的不同意见,虽然这位作者只写了几个外文词,就已经出现错误,我们还是对这些疑问予以简要答复。

最主要指责有两点:第一,书中引文不是出自“原文”,包括中国古代文献与外国语言文献,主要是引自中译本。第二,存在转引现象,或是同一种译文引自不同版本。

其实这两点批评完全不值一驳,世界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是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写作,以本民族语言文献为主体,中国人用汉语写作世界诗学史,以汉语文献为主体这是基本规则。不仅仅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其中所涉及到的译本的引文与注释,同样以本国文字的译本为依据,因为对象首先是本国读者,著作是以本国文字进行的学术研究。

为了节省时间与篇幅,我们仅举被作者大加称赞的“国际组织”的《诗学史》为例来说明,我们只需看其第一章所引用的文献就完全明白其中的引文都是法文译本,如引古希腊诗学文献时,引文注释就是“法译本,卷10,迪尔—克兰茨版”二则^⑥。由于考虑到作者可能确实对于国际学术规则不熟悉,我们不避重复,再以对于现代文学理论家如俄罗斯的巴赫金(M.M. Бахтин)等人的论述为例,也只是引用法文译本,例如该书第七部分“20世纪·3文本的接受”中,这是由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巴赫金研究家J.M.霍尔奎斯特所撰写,其中不但巴赫金的姓名被译成法文(M.M.Bakhtune),其代表作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Problèmes de la poétique de Dostoïevski)也被用法文引用,如巴赫金诗学的关键词(слова)竟然被译成法文的“slovo”,两者仅仅是同一词源,在现代批评术语中相差万里,但非此不能为法语或是英语读者接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笔者指出这些,并不是要炫耀读了几本外文书,而是在说明国际学术规则。

不知道《到》文的作者是不知国际学术规则,抑或是认为只有欧洲人才有权利不用“原文材料”?

总之,学术著作的作者当然是要以本民族语文的文献为主,即使在外文著作相当普及的情况下,选用本民族语言译本也是完全正当的。当然,对于译文有自己的不同见解是正常的,译文之差异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译法,这是翻译课第一堂就要讲到的原理,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讨论的内容。以笔者之见,当代中文学术著作译本虽然也有部分相当拙劣,但是其中大多数仍然是有水平的,只不过与本文的论旨关系不大,不必详论了。

其实,所谓“原文资料”之批评的可笑之处,更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书中所征引的俄、英、日等资料之后,却又大讲原文资料,当然不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希腊文本,也不是印度史诗的梵文本或阿拉伯诗学的阿拉伯资料,主要是《到》文作者所提到的现代英文版的资料,参考原文与选择译本是人人皆知的前提,这里根本不值得不断重复。同时,我们也要指出,某些人所说的原文其实不过是欧美人的译本,这些英法文的学术著作的翻译并不见得完美。就以英

文的“诗学”译本为例,法国学者艾田伯(René Etiemble)《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中的那句名言:“比较文学就必然走向比较诗学”^①,在英文译本中就被误译,将“比较诗学”(poétique compée)译成“比较诗歌”(comparative poetry),所幸被刘若愚先生所指出^②,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国际笑话。当然,如果让《到》文作者去找梵文诗学的或是但丁的拉丁文“原文资料”也不可能,甚至让其翻译一下时下流行的巴赫金的俄文原文也未必可行。

退一万步来说,就是《到》文所顶礼膜拜,惋惜不能再生的韦勒克,在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中,不同样以英法德等常见的现代欧洲语言文字为主吗?就连最常见的希腊文、拉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语言的资料都不具备,更不必说土耳其、亚美尼亚、丹麦等欧洲语文资料,遑论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或是印度乌尔都语批评家如乔德里·纳齐尔·哈桑的《文学批评的标准》的“原文资料”了。这是无法替其辩护的,更无法以西方学者为楷模来指责中国学者。

《到》文中还有一些不够尊重他人的说法:“中国诗学部分文献的使用很随意,大都是市面上通俗的版本,新的研究成果大都阙如。”^③我们不清楚这位批评家对于中国典籍文献特别是版本目录校勘评注之学到底知道多少,而且我们所列出的参考文献也是以出版典籍闻名的、有影响的出版社的新版本,如《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巴蜀书社2001年版)、《文学概论讲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以笔者看来,这些论著都是国内一流学者的有影响的论著,而且是近年出版,所谓“通俗版本”与“阙如”等,不知从何说起,我劝《到》文作者必须先学会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学会尊重他人的工作,特别是事关中国古籍的版本目录与文献方面。

其次,同一种著作有多种译本,我们可以从中根据译本质量、出版年代与论题选用其中一种,同时,有时为了比较或是阐释的需要,将不同版本的译文放在一起,互为对照,也是完全可以的,这样有益于更准确地把握原文。这也是《到》文作者议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不断指责《比较诗学史》选用的材料的方式,如关于詹姆斯的一段引文,他认为:“以上引文出自王岳川等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一书,该书出版于1992年,被收录其中的詹姆斯的这篇文章仅是“摘译”,这篇摘译存在不少问题。作者引用时不查看英文原文,至少也应该使用比较可靠的译本,比如张旭东1997年编译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也是很容易找到的本子。”^④詹姆斯的英文原文发表于《新左派评论》1984年夏季号,中文译本与选译、摘译相当多,流行相当广,其中影响较广的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外,尚有《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8)^⑤。写作者选用哪一种译本是本人选择的权利,这种选择是根据论题与论证过程的需要,不是哪种译本容易找到与否,更不要根据译者来选择,只能根据译文的质量决定取舍,而不是人云亦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张译本不选择其他的译本?摘译就一定不如编译吗?如果说王的摘译“很有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诸如此类无逻辑、无头绪的说法随处可见,实在没有一一指出的必要,更没有必要一一答复。

此外笔者还要就“外语水平”方面向《到》文的作者请教。在这篇文章中惟一直接涉及到一个法文词“la littérature générale”,竟然被作者译为“一般文学”^⑥,这个词其实就是所谓的“总体文学”,这也是国内外学术界无人不知的译文,笔者实在没有料到会遇到这样的说法。其实,这个词用得最多并且阐释最为有力的其实不是别人,正是作者所高度评价的韦勒克,他在《文学理论》一书的第五章“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和民族文学”中解释这个概念时指出:

“总体文学”这个名称可能比较好些,但它也有不足之处。它原是用来指诗学或者文

学理论和原则的。在几十年里,梵·第根(P. Van Tieghem)想把它拿过来表示一个与“比较文学”形成对照的特殊概念。^②

为了说明自己的看法,韦勒克特别引用了梵·第根的论文《文学史上的综合: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La synthèse en histoire littérair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et littérature générale”,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1921), pp. 1-21.) 其中韦勒克与梵·第根所说的“总体文学”都是这个“la littérature générale”。对于比较诗学学科,我们认为作者还是应对一些基础理论下功夫,没有必要将已有定译的概念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随意出新,当然,这只是笔者一己之见,仅供参考。

最后必须声明,所有认真读过《世界比较诗学史》一书的学者的意见,包括《到》文的作者所提出的一些建议,我们都是欢迎的。

①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Death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72.

②①②③ 周荣胜:《到了书写比较诗学史的时候吗?——评方汉文主编的〈世界比较诗学史〉》,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

③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王宇根、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④⑤ 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第1页。

⑤ 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引言,陈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⑥ 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界比较”》,载《读书》1981年第10期。

⑦ 饶芃子主编《比较文艺学论集》代序,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⑧ 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张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⑨ 方汉文:《比较文学高等原理》,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⑩⑪ 让·贝西埃等主编《诗学史》上,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导言)第2页,第8页。

⑪ 以上均根据周荣胜《到了书写比较诗学史的时候吗?——评方汉文主编的〈世界比较诗学史〉》,第136至142页的有关论述。

⑫ 可以参见笔者著《比较文学高等原理》第八章(第296页—第341页),主编《比较文学基本原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关于比较诗学历史的论述。

⑬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338页。

⑭ 王树英主编《季羨林论中印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页。

⑮ René Etiemble: *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rbert Weisinger & George Joyaux (tran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54.

⑯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导论》,杜国清译,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⑰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212页。

⑱ 周荣胜:《到了书写比较诗学史的时候吗?——评方汉文主编的〈世界比较诗学史〉》,第142页注释②。

⑲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等译,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宋蒙